

国际纵横

从中东冲突看亚洲区域整合的关键抉择

顾清扬

中东战局持续升温，正迅速外溢为一场具有全球系统性冲击的危机。新加坡外长维文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封锁风险，界定为一场“亚洲危机”，这一判断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揭示当前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关键现实：当冲突发生在中东，经济后果却往往首先在亚洲显现，并被放大。

亚洲之所以成为这场危机的重灾区，首先源于对中东能源及关键运输通道的高度依赖。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，主要流向正是亚洲。日本、韩国、中国与印度等主要经济体，对中东能源均存在较高依赖度，且相当比率依赖这一单一通道。一旦航道受扰，供给不确定性将迅速转化为价格波动与风险溢价。

然而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。过去数十年，亚洲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与增长引擎，当前全球约一半的制造业产出集中于亚洲。从中国的完整产业体系，到日本与韩国的高端制造，再到东南亚国家承接的生产网络，亚洲构成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区域。

制造业的能源密集属性，对油气价格高度敏感。尤其是化工产业，既依赖石油作为能源，又以它为基础原料，价格上升将迅速传导至整个工业体系。同时，亚洲亦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业区域之一，对化肥需求巨大，而化肥生产高度依赖天然气与石油。这意味着，能源冲击不仅影响工业成本，更可能通过粮食价格传导至社会稳定层面。

因此，与其说亚洲“受到影响”，不如说亚洲正处于一个结构性脆弱的位置：既高度依赖外部能源，又深度嵌入全球生产体系，成为外部冲击最容易“内生化的”区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本轮冲突带来的变化，不仅体

当前的挑战在于，如何在既有机制基础上，推动一次以经济安全为导向的再整合。换言之，亚洲须要从“自由贸易区”迈向“抗冲击共同体”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不同经济体可以发挥各自优势。

现在经济层面，更体现在政策认知的转变。多个亚洲国家已不再将能源问题视为单纯的市场波动，而是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。

新加坡已启动跨部门危机应对机制，聚焦能源供应、航运稳定与物价控制；日本与韩国分别加强能源安全评估与紧急协调机制；印度则通过特别工作组应对能源与通货膨胀压力；亚细安多国亦通过补贴与政策干预，稳定国内市场。

“效率优先”让位于“安全优先”

这一系列举措表明，亚洲正在经历从“市场应对”向“安全应对”的转变。能源、航道与供应链不再只是经济变量，而被重新定义为战略资产。全球化长期以来所依赖的“效率优先”逻辑，正在让位于“安全优先”的新范式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风险溢价开始取代成本优势，成为影响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。能源价格不再单纯由供需关系决定，而是被地缘政治与安全预期所锚定。这种变化，意味着外部冲击将更容易通过价格、金融与预期机制，转化为区域内部的系统性压力。

面对这一新局面，亚洲是否仍将延续过去被动承压的路径，抑或转向主动构建规则，成为当前的关键问题。

事实上，亚洲并不缺乏合作机制。从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到亚细安“10+3”，从清迈倡议到区域基础设施合作框架，区域内已形成一定程度的制度基础。然而，这些机制多建立于效率导向的全球化阶段，核心目标在于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，而非应对安全冲击。

当前的挑战在于，如何在既有机制基础上，推动一次以经济安全为导向的再整合。换言之，亚洲须要从“自由贸易区”迈向“抗冲击共同体”。

这一转型可从四个方面推进。首先，在能源领域，应加强供应多元化、储备协调与可再生能源合作，逐步构建区域能源安全网络。其次，在产业链层面，应从单纯的分工转向更深层的嵌入式合作，提升区域内部的供给稳定性。再次，在金融领域，应推动本币结算与区域流动性支持机制建设，以降低对单一货币体系的依赖。最后，在基础设施方面，应加快互联互通，形成更具韧性的区域循环体系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不同经济体可以发挥各自优势。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与规模优势，可提供供应链稳定性；日本与韩国具备技术与资本优势；印度拥有庞大市场与潜在制造能力；亚细安则是连接区域生产网络的关键节点；新加坡则可在金融、结算与风险管理方面发挥枢纽作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明确呼吁，中国应在区域中发挥更大作用。这一表态不仅反映区域国家对稳定的现实需求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中国作为“系统性稳定器”的期待。

在新的区域格局中，中国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。过去，中国更多通过规模与市场容量，为区域提供需求与稳定；但在当前环境下，仅依赖这一“被动稳定”，已难以应对系统性冲击。

更具前瞻性的路径，是推动从“稳定器”向“机制构建者”的转型。其中，一个具有操作性的

方向，是构建“中国+N”的产业链稳定机制。

这一机制的核心，不在于强化单一国家的主导地位，而在于通过制度化安排，将产业链稳定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。具体而言，可在关键产业领域推进战略对接，与亚细安及其他伙伴共同投资基础设施，促进技术共享，并建立风险分担机制，提升整体抗冲击能力。这种嵌入式合作，将使区域供应链不再依赖单点稳定，而是通过网络化结构实现韧性增强，也有助于降低地缘政治冲突对经济体系的冲击。

当然，区域整合并不会在真空中展开。亚洲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的地区，中日、中印关系以及南中国海问题等，都可能对合作构成约束；美国在区域内的存在，也为制度安排带来额外变量。

在分歧中推进合作

因此，现实路径不在于回避分歧，而在于在分歧中推进合作。历史经验表明，危机往往是合作的催化剂。亚洲金融危机、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冠病疫情冲击，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区域机制的深化。在当前背景下，一种可行策略，是从功能性领域入手，在能源安全、供应链稳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对低敏感度领域推进合作，通过实际利益绑定逐步积累互信。

同时，通过制度化安排提升政策透明度与预期稳定性，使市场主体能够在不确定环境中长期决策，是区域整合得以持续的关键。

从中东冲突到亚洲危机，这一演变路径揭示当代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：地缘政治冲击正通过结构性依赖，被不断放大并内生化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亚洲既是受冲击最直接的区域，也可能成为制度创新最活跃的区域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